

天津文史資料選輯

第二十六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編

天津人民出版社

天津文史資料選輯

第二十六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編

天津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一月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十六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印张 2插页 156千字

1984年1月第1版 1984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统一书号：11072·138

定价：0.75元

目 录

黎明前的战斗·····	王文化 (1)
回忆我在天津电信局的地下工作·····	陈典明 (13)
回忆解放战争时期的胜芳保卫战·····	刘肖岩 (19)
我的失足与回头·····	朱占魁 (30)
 一代艺术宗师张大千·····	张慈生 邢捷 (53)
 长芦盐务述略·····	陈隽如 (82)
长芦盐的生产与盐工·····	王眉公 (93)
长芦汉沽盐区灶户组织发展沿革·····	王采轩等 (98)
盐务稽核所的历史简述·····	朱德君 (105)
我所知道的芦纲公所·····	岳仲嘉 (114)
裕蘩盐务公司兴衰概略·····	李邨亭 (122)
长芦盐务的两大案件·····	纪 华 (127)
国民党两大特务系统对盐务机构的控制·····	朱德君 (139)
长芦汉沽区滩户桐裕成张家发家史·····	张秀珊 (146)
 国民党军统局在天津的特务活动概况·····	舒季衡 (158)
我所知道的国防部保密局天津特别站·····	范国栋 (201)
军统局特务头子戴笠来天津的活动情况 ·····	王子晨 舒季衡 (209)

质疑·订正·补充

有关北方书店的史实订正·····(217)

补	津南县的设置和撤消 (29)	长芦近代历任盐官 (92)
	长芦十一任缉私统领之更迭 (113)	盐务稽核所总办扶乩
白	拜佛 (121)	解放前汉沽的十等灶户 (138)

黎明前的战斗

——回忆配合天津解放的地下斗争

王 文 化

一九四八年二月，我由华北局城工部北平学委派到天津工作。根据上级指示，我来到天津以后，很快地就与徐才和何朔两位同志接上组织关系，建立了职业党支部，由我任支部书记，徐、何任支部委员。职业支部成立后，把原来分散在社会职业阶层工作的党员组织起来，约有三十多人，分布在国民党政府机关、学校、医院、工厂企业、商行等二十多个单位。这些党员大多是由大学转到社会工作的青年，也有少数是进入社会工作多年的党员。他们都深深地隐蔽在敌人的心脏里。

一九四八年下半年，为了适应工作的发展需要，在职业支部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共天津职业委员会，由我任书记，徐才和常芝同志任委员。上级领导，初为沈勃，后来是中共北平学委委员崔月犁同志。党员人数增加到五十人左右。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为了配合解放天津，根据华北局城工部刘仁同志的指示，决定把华北局城工部北平学委原来领导的天津地下党组织（简称“北系”）与南方局学委系统领导的天津地下党组织（简称“南系”，是在抗战胜利后由大后方转移来津的）合并，成立中共天津工作委员会（简称“天津工委”），由五人组成，书记为黎智，委员有李之楠、魏克、沈尔

琳、王文化。天津工委下设三个委员会：一是市政银行党委会，李之楠兼任书记，委员有李定、张克诚；二是企业党委会，王文化兼任书记，委员有徐才、蒋振宝；三是学校党委会，魏克兼任书记，委员有沙小泉、廉仲、方卫。沈尔琳同志负责机关工作兼管一部分学校工作。在天津工委成立之前，南、北系的地下党工作，是分头领导，各自为战的，彼此之间没有横的组织关系；天津工委成立以后，对南、北系的地下党组织实行了统一领导，统一指挥，形成联合作战的有力局面。

天津工委由华北局城工部直接领导，并给天津工委配备了一部秘密电台，每天都可直接向华北局城工部请示工作。这样，大大加强了地下党的战斗力。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到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天津解放，天津工委一直在紧张地进行工作。由于当时解放战争已经发生转折性的变化，地下斗争处于非常有利的形势下，工作开展迅速，及时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的攻城。本文着重回忆在天津解放前夕我所经历的地下斗争情况。

一、组织群众进行护厂斗争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间东北全境解放之后，战线移向华北。十二月，人民解放军重兵包围北平、天津，并切断了平津之间的铁路交通，天津守敌已成瓮中之鳖，解放天津指日可待。在这种形势下，天津工委根据上级指示，发动党员、基本群众和上层统一战线对象，广泛展开护厂斗争，动员技术人员留下，粉碎国民党当局破坏工厂设备、南迁技术人员的企图。

天津工委领导党员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对国民党各工厂企业的经理、厂长及技术人员，广泛接触，开展工作，宣传我党

的城市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指明在解放后知识分子、技术人员才真正大有用武之地，希望他们在解放天津的过程中为人民立功。经过一番工作以后，许多大工厂企业的负责人都表示倾向我们，如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的造纸公司经理赵煦雍、灰堆造纸厂厂长羌逢戌、造纸分厂厂长余貽骥、汽车修配厂厂长李宗海及技术科科长李天民、汽车修配厂分厂厂长唐敬修、联勤毛织厂工务科长周匡等。担任海河工程局修理厂副厂长的地下党员周旭东，除了在局内的工程技术人员进行争取工作而外，还做了国民党卫生部中央医院院长陈崇寿、小儿科主任毕金钊的工作。在国民党政府的税务局、教育局、工务局、邮政局、华北水利委员会、铁路局机务段、铁路机车配件厂、铁路医院、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证券交易所、南开大学、北洋大学、河北工学院、师范学校、大公报社、益世报社等三、四十个单位里，都有地下党员在进行工作。除了发动群众进行护厂、护校、护院外，还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及时送到华北局城工部，为接管天津提供情报。

在迎接天津解放的斗争中，天津工委还发展了一批党员，特别是在青年中发展了民主青年联盟。在天津解放时，共有地下党员及“民青”近四百人，联系的群众上千人。他们都是护厂斗争的积极分子，在天津解放之后，又成为协助军管会进行接管工作的骨干力量。

二、保证水电畅通

根据华北局城工部的指示，在护厂斗争中，一定要保证做到电力、电讯及自来水的畅通，要求地下党把这些单位作为重点保护好。为此，我们通过地下党的可靠社会关系，预先与国

民党的电业局、电信局和市企业公司（它管辖自来水厂）的局长、经理约定好，我以共产党代表的身份亲自去找他们，面对面地交待我党的入城政策及对知识分子、技术的政策，要求他们认真组织护厂，保证电力、电话和自来水的畅通。

在供电方面，我首先找了电业局供电科科长余克稷工程师，再通过余与局长顾敬曾和副局长郑世夔约定会面，经过谈话后他们都表示接受这一任务，保证电力供应不中断。特别是余克稷工程师，思想要求进步，又掌握变电、供电的实际指挥权力，他接受任务后表现很积极，解放后被评为劳动模范，提升为总工程师及电力局副局长。在供电科我们还直接对有地下党关系的张玺诚工程师布置任务，要求他具体掌握输电岗位和做好抢救电路的准备工作。第一发电厂是最大的一个电厂，该厂金克刚工程师是我们的地下关系，通过他去做厂长及其他工程技术人员的工作，确保安全发电。这样，在电力供应方面，从上到下我们都能控制起来。在解放天津的战役中，除了有的电路被炮火打断外，基本上保证了电力供应没有间断。

在电信方面，我以共产党代表的身份，通过地下党的社会关系，亲自去找电信局局长黄如祖面谈。据介绍说，黄早年曾参加过共产党，后脱党改做技术工作，抗战期间曾负责建设昆明的电话系统，一九四五年去莫斯科参加过国际电讯会议。我根据他的历史，向他讲了党的入城政策，希望他在解放天津的过程中为人民立功。他接受了我们的布置给他的任务。在电信局内部，有地下党员崔思九工程师在下面群众中做工作，相互配合。这样，在解放天津的过程中，基本上保证了电讯和电话的畅通。在解放前夕，我要求黄如祖公开无线电话的波长，并撤消干扰，因此我在收音机旁就可以清楚地听到天津警备司令部

与北平傅作义及南京政府之间的无线电通话，直到一月十五日凌晨人民解放军冲进敌司令部时为止。

在自来水供应方面，我也是以共产党代表的身分亲自会见天津市企业公司的总经理（名字忘记了），交待政策，晓以大义，要求他保证自来水的供应。

总的来说，在解放天津的过程中，以至解放之后，地下党经过工作，基本上保证了电力、电讯、电话和自来水的畅通。这对天津解放后迅速恢复生产，安定人民生活 和 保证 社会秩序，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三、对资产阶级上层人士开展统战工作

配合解放天津的战斗，如何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把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界稳定下来，使他们打消南逃的打算，并争取他们在政治上站到我们方面来，这在当时是一项影响很大、非常重要的任务。恰好在这时候，我接到刚刚从上海坐船到达天津的地下党员周骥良的组织关系。周骥良同志是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周叔弢先生的侄子，他本来是路过天津回北平工作的，北平学委为了让他协助天津地下党作资产阶级上层的统战工作，决定他留在天津。为了打开对资产阶级统一战线工作的局面，我们研究决定首先作好天津民族资产阶级中最孚众望的两个代表人物的工作：一是久大盐业公司总经理李烛尘，二是唐山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周叔弢。他们是北方最大的两个工业财团的头面人物。争取这两位知名人士与我们合作，成为打开对民族资产阶级统战工作的关键。

周骥良早在一九四二年就接受北平地下党的领导参加了地下工作，后来入了党。当时分析由周骥良直接出面做周叔弢先

生的工作有困难，因为他在周家的大家族中年纪轻，刚刚进入社会职业阶层，在社会上没有什么声望和地位，又刚刚来到天津，贸然去找他伯父谈这样重大问题，恐怕未必适宜。于是就决定周骥良去找他哥哥周慰曾。周慰曾当时在天津开设建华贸易公司，在社会上已经小有名声，是周家的少壮派。经过骥良与他哥哥一谈，就把事情谈妥，他很愿意做这件事。于是第二天就由周慰曾与周叔弢先生约好，周慰曾陪同我到启新洋灰公司去找周叔弢。我当时是以地下党代表的身份去和周叔弢先生会谈的，周慰曾也在场。在我向周叔弢讲了当时即将解放的形势和党的政策时，周叔弢先生表示他对共产党有些了解，他读过毛主席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等，他对毛主席非常赞扬。我去会见周叔弢那天，恰恰是唐山刚刚解放，他表示很关心启新洋灰厂工人们的生活，他说准备了一些金条，想请我们转到唐山给工人发工资。我当时表示：唐山解放后，人民政府会组织恢复生产，保证工人的生活，请他放心。周叔弢还谈到他多年收藏有宋、明、清版本的书籍，准备解放后献给国家（这件事周叔老在解放后实践了他的诺言，向人民政府捐献了自己收藏的大批古版书籍，并受到政府的奖励）。我在与周叔弢先生的会谈中，主要商量如何开展工商界人士的工作，把工商界知名人士稳定下来，并争取他们在迎接天津解放过程中做出贡献。周表示这要和李烛尘先生商量（因为周与李的私交甚厚）。当时商定，由周叔弢先生与李烛尘先生约定好，我们第二天就去会见李烛尘先生，并约好我到周慰曾的建华贸易公司（在今解放路）等他。于是我就结束了与周叔弢先生的会谈。

转天，周叔弢与李烛尘联系的很顺利，按约定时间，周叔

驶坐他自己的汽车到建华贸易公司接我。我们一起坐车到久大盐业公司（在今中心公园附近）去会见李烛尘先生。李烛尘是北方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代表人物，曾参加过在重庆召开的旧政治协商会议，与周恩来、董必武和徐冰等中央领导同志有过交往，在政治上有相当的经验。见到他时，我除了谈了形势和政策外，就把中共中央决定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和郭沫若等人在香港发表拥护召开新政协的讲话和铅印材料（装订在伪装的铅印公开发行的书里边）送给他，并要求他发挥他的影响，在解放天津中起更大的作用。在第一次见面时，李烛尘表现很沉着，表示愿尽自己的力量做工商界和国民党上层人物的工作。在与周、李会谈之后，除了我当时以共产党代表的身份去找李烛尘商谈工作外，在《大公报》社工作的共产党员李定同志还以记者的公开身份接触李烛尘，这样地下党可以把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很好的结合起来。在解放前夕，李烛尘和周叔弢联合出面，在天津著名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聚会的地方——三五俱乐部，召开过资本家座谈会多次。这样，我们通过李烛尘、周叔弢加强了对资本家的工作，稳定了资产阶级上层人物的情绪，适当地宣传了我党的城市工商业政策，使一些资本家都知道我党“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在我和李烛尘接触，谈到我党政策时，李说久大、永利两个工厂的工人都持有公司股票，宣称他们已经实现了劳资合作。当时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各阶层迎接解放，对他的这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观点，没有必要纠缠，这个问题留在解放后比较容易解决。但在另外一件事上却是有分歧的：在我定期访问李烛尘时他曾提出：为了天津市居民的安全，避免城市 and 居民遭到炮火的破坏，建议向中共中央反映，最好从北平、天津到塘

沽，给傅作义的军队让出一条路，让国民党军队从海上跑掉算了。我们分析李烛尘的这个意见，主要是担心解放战争会破坏城市里的工厂、企业，怕损害资本家的根本利益。这件事我们当天就通过地下电台请示华北局城工部，当即得到刘仁同志的明确指示：告诉李烛尘先生，我人民解放军的炮弹打得很准，只打敌人的军事阵地，不打工厂企业，请李烛尘放心。事实也恰恰如此，在解放天津战役中，除棉纺七厂毁于炮火之外，其它工厂几乎没有受到什么损失。

我们还通过李烛尘做劝降工作。我们建议他去找天津市的几个掌权人物面对面去谈，他答应了。先去找了天津市长杜建时。杜开始表示犹犹豫豫，后来说了实话：“陈长捷这个人不好讲话，他是傅作义的人，我是中央嫡系的文官，他是武官，怕他翻脸不认人，我愿意和平解放，但对陈长捷我没有办法。”李烛尘又去找警察局长李汉元，李汉元说同意投降，但他只能管警察，管不了部队，也扭转不了形势。最后李烛尘直接找到警备司令陈长捷谈，陈说他不能对不起傅先生（指傅作义）。又通过杨亦周去做陈长捷的工作，得到的也是类似的答复。劝降工作不能一下子见效，而李烛尘的住所附近已经有了便衣盯梢了，我立即通知他要小心注意，并告诉他有紧急事可找《大公报》社，我说《大公报》消息灵通，也没告诉他打电话找谁。直到一月十四日晚十一点左右，李烛尘打电话给《大公报》说，陈长捷已经同意投降了。《大公报》的地下党员李定，打电话把这件事告诉工委书记黎智同志，回答李烛尘的是：投降已经晚了，解放军已经打进来了。

在解放前夕，还有这样一件事。李烛尘先生和我们商量，如果解放军还没有到，有的地方地痞流氓乘机抢劫怎么办？由

于当时对解放大城市还没有经验，我们就答复他说：当地警察应尽职尽责保护人民生命财产，解放军的攻势迅猛，打一个地方就占领一个地方，根本不存在地痞流氓抢劫的问题。李汉元就根据我们的答复，通过李烛尘先生向我们请示，要求从救济总署仓库中发给每个警察两袋面作为奖赏。我们答复他：发面粉可以，但不许抢。当时物资控制在国民党手里，李汉元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为了在解放后不追查他的责任。以上这些工作说明，虽然我们通过李烛尘向国民党当局劝降没有成功，但在动摇国民党的党政军警上层人物的士气和瓦解他们的斗志上，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在天津解放前几天，根据华北局城工部的指示，我和朱琨同志（从城工部来天津准备去北平工作，因平津交通中断受阻，暂时留在天津协助工作）去会见国民党官僚资本中纺公司天津分公司总经理杨亦周，要求他保护好中纺所属的各棉纺厂，迎接天津解放，为人民立功。杨亦周先生是国民党上层人物，除担任中纺公司总经理外，还是市参议会的议长，社会地位较高。他同意了我们提出的要求，这不仅对天津几个大棉纺厂的护厂工作是一个有利条件，同时在政治上也产生很大的影响（解放后得知，北平学委崔月犁同志一直和杨亦周保持联系，为我们做工作）。

四、情报工作

国民党当局为了对抗人民解放军的进攻，在天津外围大肆筑造城防工事，并由国民党政府工务局建筑科负责验收。

地下党员张克诚同志以工务员（即技术员）身份为掩护，在工务局建筑科工作，负责验收城防公路。这条公路位于城防

围子里，是准备打仗时运送弹药和给养的。张克诚是搞外勤的，有通行证，随时可以出去。张克诚办公桌对面是一位姓常的工程师，有一天快下班时，常工程师正在看一张图纸，忽然局长派人来找他，“当时他顺手把图纸放在书架上，就匆忙地到局长那里去了。等到下班人全走了以后，张克诚把图纸放在公事包里，拿回家去。这是一张天津市城防工事布置图。图上把整个城防碉堡包括明堡、暗堡、地堡、外堡、内堡，描绘得很清楚。当时没有现代化复印设备，张克诚是北大工学院土木系毕业的，他就把图纸描绘下来，然后再把图纸放回原处。张克诚同志就是这样巧妙地搞到城防工事布置图。接着张克诚又利用职务的便利条件，以检查城防公路为名，到现场进行实地观察，把碉堡的实际布置情况记在心里，回家后，又在布置图上标记下来碉堡的实际状况和火力点。张克诚同志完成敌军城防工事布置图的复制任务后，及时交给地下党转送到城工部。这对我军掌握天津周围守敌的碉堡及其火力点是非常重要的情报，使我军对天津敌军的守备情况，作到了“了如指掌”。

五、护送党内外同志去解放区

从一九四八年八、九月以后，直到天津解放，我们接受北平学委崔月犁同志交给的任务，由徐才同志具体负责，组织接送从香港、上海乘船路过天津转去解放区的人员。人数较多的有三批，每批约有十来个人，零星接送的也有好几次。他们当中有民主人士、党员、技术人员、文化人、教授，还有淮海战役国民党起义军官家属。第一批下船后住在旅馆里，然后到地下党的社会关系家化装后，派地下党员做为交通员护送到解放区域城工部。第二批就把客人分散住在地下党员和地下党社会关

系家里，然后化装派交通员护送到城工部。第三批从香港乘船到达天津时，当时由于人民解放军正加紧围困天津国民党守敌，已经无法安全护送出去，只好在市内把客人分散安排在可靠的住处。迪化道中心小学校长陈继揆是地下党员，由他负责在学校内安排了十来个人；另外几个人安排住在常德道地下党的工作关系金克刚家里（即现在冶金局院内第四所楼），由金克刚夫妇照料。因为金家是个大公馆，从来不查户口，比较安全。最后一批客人，直到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天津解放，才最后完成转送任务。

护送转移三批人员，没有发生问题。有一批的护送人是一个中学教师叫张崇善，他护送沈甫和羊枣的夫人，到泊镇遇到国民党的关卡，国民党一看不象一般人就盘问，张崇善同志很机警，打了个圆场过去了。被护送的人中还有郭沫若的女儿郭淑瑛，是个大学生，与孟秋江同志同行，因为她不会说中国话，在关卡盘问时就装哑巴，也得以安全通过。其它还有范长江同志的夫人、美学家蔡仪同志和他的夫人。国民党联勤毛织厂是个军用工厂，厂大门有武装警卫，比较安全，楚图南同志从南方到天津后，就住在该厂院内周匡同志的宿舍里，约掩护了一周后才转送至解放区。我们所护送的人，都要求其将三大件留下：一是西服、大衣，二是手表，三是派克牌钢笔。因为这些东西过国民党关卡时，是一定会被没收的。留下的物品暂存在地下党员家中，到解放后再发还本人。有一个国民党起义军官的家属，带了许多金子来天津，为了安全，我们就将金子留下，到解放区后才交还她。当时住在电业局宿舍的地下党员章守定同志，负责保存了许多衣物、手表、钢笔等。另外，为了客人化装以便通过国民党关卡，我们组织了一些男、女共产党

员到估衣街负责给客人购买中国式便装、棉袄等，因为分头去买，不致引起敌人的注意。总之，地下党交给我们转送从港沪路过天津到解放区去的客人，无一发生问题。

地下党在配合解放天津的地下工作方面取得的胜利，主要有两个客观因素：一是战场上的有利形势，在全国各战场上，人民解放军节节取得辉煌胜利，天津周围，也已经是大兵压境，在这样有利的形势下，地下党开展工作十分顺利；另一个是国民党统治的极其腐败，人民群众盼望解放，心向共产党，心向解放军，给地下党的工作以很大的支持。我们地下党员在数量上虽然不多，但很有力量，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得到各阶层人民的支持。

天津的解放，人民解放军是主力军，是第一条战线；地下党是第二条战线的配合军。人民解放军兵临城下，并在战斗中发挥了无坚不摧的威力，为地下党的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可以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当时在天津进行地下斗争的不仅是天津工委，还有党的几十个地下组织系统，可以说是条条大路通向共产党、解放区。在解放战争期间，第二条战线到处出击，非常活跃。胜利是由于两条战线的紧密配合、相互支援而取得的。